

# 人文齐鲁



►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英语专业60级毕业照。

## 1960年开始的大学生活

【口述实录】

□曹务堂

1960年,我考入了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外文系。入学三天后,我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学校是啥模样,就被拉到齐河县柳桥公社去帮助社员秋收秋种。我们十几个人挤睡在用麦秸铺的大通铺上,每天到地里帮助社员干活,刨地瓜、割豆子、拉犁、翻地、种麦子,样样活都干。有时候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

因为来自农村,我对于农活并不陌生也不惧怕,但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那时我们学生自己办伙食,吃的是用发黄的洋槐叶和玉米面蒸的窝窝头,外加少量地瓜。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极度匮乏,口粮实行定量。吃不饱、活又重,不得已,我只好趁中午休息时到村外或田野里捡一些落在地上的小干枣或黄豆粒充饥。

一个月的助农劳动结束了,我们返回学校上课。我们这一届共有32名同学,本来应分为两个小班,但因当时师资缺乏,只好合班上课。

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但令我感到十分新奇的是,我们班里还有四名归国华侨,分别来自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来说,看见他

们就像见了外国人一样。他们戴着手表(当时手表是极为珍贵和罕见的物品),身穿花格的确良衬衫,脚踏一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字形塑料拖鞋,操一口非常外国味的中文。我们农村的孩子行李大多是一个包袱裹着所有的家当,而他们的家庭却殷实富有,例如,我们班一位来自印尼的女同学的行李竟然是皮箱和大包共九件,令我们十分开眼和咋舌。1962年“五一”节游行时,我们班其他七位女同学穿的裙子都是向这位女华侨借的。

在我们班的32名同学中,几乎一半的人在中学学过英语,甚至有人学了六年,已经能够阅读英语简易读物《Little Tom》(《小汤姆》),而我和其他同学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因为我们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幸好我们使用的课本是许国璋先生编的《英语》,这本书是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的。所以,我觉得学起来和他们的距离并不大,好像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当时,学习上没有多大困难,而最大的问题仍是饥饿。由于粮食定量不够吃,营养跟不上,许多同学都得了水肿病。虽然50多年过去了,但我至今仍难忘同学们下晚自习后饥肠辘辘、饥饿难忍,不得不喝点开水加酱油充饥(因

为是饥饿而非口渴,只喝开水难以以下肚,故加点酱油以调味),那令人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今天想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在那个年代,因不堪忍受饥饿之苦而弃学回家者不乏其人,我们班的两位同学和俄语班的一个中学老乡就跑回了家。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学校号召大家生产自救,“见缝插针”种瓜菜,搞所谓的“瓜菜代”(以瓜菜代替粮食)。于是教学楼和宿舍楼前后的空地、路边的花园都被开辟出来种上了胡萝卜和其他蔬菜,就连学校的足球场也被开垦种上了地瓜(那时体育课停了,盖因学生无力跑跳)。我们班一共开出了近一亩地,我当时是班委会的劳动委员,负责蔬菜的种植和管理。种菜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水,二是肥。因为各班都种菜,用水就必须“抢”,于是我只好趁别人午休的时间去浇地。因此,我在大学三年从来没有睡过午觉。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同学们三人一组,两人抬着大铁桶,一人扛着柄长约三米的大铁勺,每天早起轮流值日到教学楼和宿舍楼后的化粪池里去淘粪。事实上,与其说是“淘”粪,不如说是“抢”粪,因为各班都在淘,你起晚了就淘不着。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木西

自小在栖霞山村长大,人们都知道栖霞这个地方长苹果,可在自己的记忆中,苹果自有一番滋味萦绕在心头。

小时候,村里只有一小片果林。老秋时节,父亲仅买一筐“国光”苹果。苹果藏在只有母亲知道的地方,教着日子拿给我们姐弟解馋。每次得到苹果,我会将果肉消灭得干干净净,再将果核放进嘴里,嚼没了滋味,才恋恋不舍送出口去。甜津津、酸丝丝似琼浆甘露的汁液,像久旱的田野洒下几滴露珠,吃过却没吃够苹果的心,如生了许多蹦蹦跳跳的小馋虫,无可奈何且无法排遣。

物质和精神一样贫乏的岁月,露天电影会使男女老少兴奋不已。勤俭节约的母亲,为了不让我们眼馋别人嗑瓜子,常揣上一个苹果,电影放映时,一分为二给我们姐弟。母亲“英明”之举让我吃着苹果看电影,感觉如同过年吃糖,又美又甜。

摘苹果(即到林子找遗留的苹果)让我至今难忘,当喇叭广播放山,天即使刮着北风,下着小雪,我们也会拎着篮子上山。走进果园如出笼的小鸟四散分开,每棵树绕上一周,仔细看上面的枝杈,认真掀翻重叠堆积的枯叶。偶尔摘到树上遗漏的苹果如获至宝,无法按捺的狂喜会无所顾忌地狂叫。整片果

【民间记忆】

## 井沟苹果

林让我们这群孩子翻个底朝天,才会互相喊着名字走到一起,每个人脸冻得比苹果还红,篮子里的苹果却让幼小的心灵忘了寒冷。

虽说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粮,还能饱腹肚子,可鱼、肉都是稀罕之物,一年难见几次。全国奔小康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年少的我听村里人解释“小康水平”就是每天吃一个苹果。我对每天吃一个苹果求之若渴,但想想家境和村里唯一的果林,觉得所谓“小康水平”就是“胡思乱想”罢了!

“捉襟见肘”的苦日子,让人们开始尝试各种让生活好一点的办法。村支书号召栽“富士”苹果时,想过好日子和“二大爷滚坡,你滚我也滚”的人家都栽上了苹果苗,可大都把苹果当盆景,诚然也当不了菜。没人料到苹果会让“山穷水尽”成为“柳暗花明”又一“春”。又大又红的苹果,仿佛神话中的“金果”,十几元钱一斤,成了乡亲们的摇钱树。

人们将所有热情投入到了果苗里,施肥、浇水、锄草,辛勤换来了丰收,苹果让家乡脱去旧衣换上新装,红了胶东屋脊的土地。家乡陆续引进“嘎拉”、“莎莎”等品种不同的苹果,口味各异让我懂得什么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们村的“井沟”苹果,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势和土壤,口感极佳。这座山竟因苹果有了一段佳话:那是村里人,将“井沟”山上的苹果拉去北京,送人品尝时实实在在地说:“俺这是井沟苹果,可好吃了。”第二年秋,北京果商到栖霞找井沟村苹果,遍尝栖霞费尽周折,才知不是村名而是山名。当吃到井沟苹果后,果商开心地说:“这真是井沟苹果,可好吃了。”从此这成了村里人的笑谈,逗乐吃苹果时会说:“俺这是井沟苹果,可好吃了。”

从书籍中知道苹果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聪明果”。因为其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纤维素、维生素等营养,所以被科学家称为“全方位的健康水果”。

中国“苹果节”诞生后,栖霞被评为“全国苹果第一市”和“中国苹果之都”。从烟台堆积如山的苹果中得此殊荣,足见家乡苹果非同一般。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 鲁西南从前的麦收

□李国兵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上世纪80年代初,那里的生产条件还比较差,农业生产基本上全靠人力。有能人总结了农村的四大累活,麦收打场就是其中之一。

打场先得有场。找块空地,二分大小,铲高填低,把地面找平,均匀地洒上水,撒上麦糠,就套上牛拉着碌碡(即石碾子)轧。轧一遍,再洒一遍水,撒上麦糠,反复两三次,土轧实轧平了,场

也就成了。

麦子从地里割回来,就摊在场里晒,这叫晒场。摊的时候得均匀地摊,摊厚的地方晒不透,摊薄的地方就浪费了场。摊好了,就让麦子自己在那里晒,别的话该忙啥忙啥,不耽误。

过个把钟头,就用杈来翻翻,和烙饼一样,翻个个儿,晒得匀实晒得透。晚上不下雨,就让它继续在那里摊着晾。人就迷迷糊糊地睡,睡不实,还有半个耳朵醒着,听见起风,扑棱就起

来了,穿上衣服就往场里跑,赶紧把摊着的麦子垛成垛,不能让雨淋了。

晒个两三天,麦秆麦穗都晒透晒酥了,就开始轧场。轧场一般都在中午头,太阳越热越晒越是干活的时候,这时轧场,麦穗都能轧开了,不会落下麦粒。轧场的人随身三件宝,草帽、鞭子和粪筐。草帽挡太阳,鞭子赶牛,粪筐接牛粪。看见牛尾巴刚要翘,赶忙用粪筐去接着,不能让牛粪脏了粮食。

轧场的时候,旁边得有个打下手的。碌碡轧过去了,打下手的就在后面把轧实的麦秸秆翻翻,等着再轧过来。如此反复四五遍,麦穗都轧开了,麦粒都落下来了,就算轧好了。打下手的开始挑麦秸,摩挲着挑,不能把麦粒带起来了。轧好的麦秸在场的角落里垛成垛。打下手的开始显功力了,垛的麦秸垛,又高又圆又直,风吹不歪雨淋不透,真是一个好垛。麦秸也是宝,除了平时当柴火烧锅,还用来苫屋,麦秸苫的屋,屋顶厚厚实实的,冬暖夏凉。

轧出来的麦粒摊在场里晒,用木锨摊开,摊得方方正正的,有沟有背。先摊个南北方向,晒个把钟头,用木锨蹬过去,再摊成东西方向,让麦粒充分地享受阳光。

傍晚了,晚霞映红了天边。风刮起来了,开始扬场。麦粒堆成了大堆,人站在侧风向,一人上锨一人扬,顶着风把簸箕里的麦子扬出去。扬场是个技术活,技术好的人,扬出来的层次分明:沙粒石子落在上风头,麦糠落在下风头,中间则是麦粒堆,金灿灿的,呈美丽的弧形。

地里的麦子都收回来了,打下来的麦粒都晒干扬净装进了瓮里。麦收到了尾声。垛在角落里的麦秸垛又摊开了,这是牵场。牛拉着碌碡轧了两遍,麦秸又重新垛了起来。多多少少还能牵十来斤麦粒,直接送到了馒头房或者烧饼铺。麦收这几天里,忙得来不及做饭,都是那里除现成的干粮,现在忙完了,就赶紧还账。

场空出来了,地不能闲着。等着下一场透雨,把地耕起来,满地都是坯块坷垃,精细的作物不长,种的是扑扑拉拉满地爬秧子的地瓜。

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的物质生产条件越来越好。先是有了脱粒机,不用再轧场脱粒;后来又有了联合收割机,机器开进麦地里,就光等着在地头上盛麦粒,麦收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程序的简化,那些和麦收相关的名词也渐渐远去,无人再提起了。